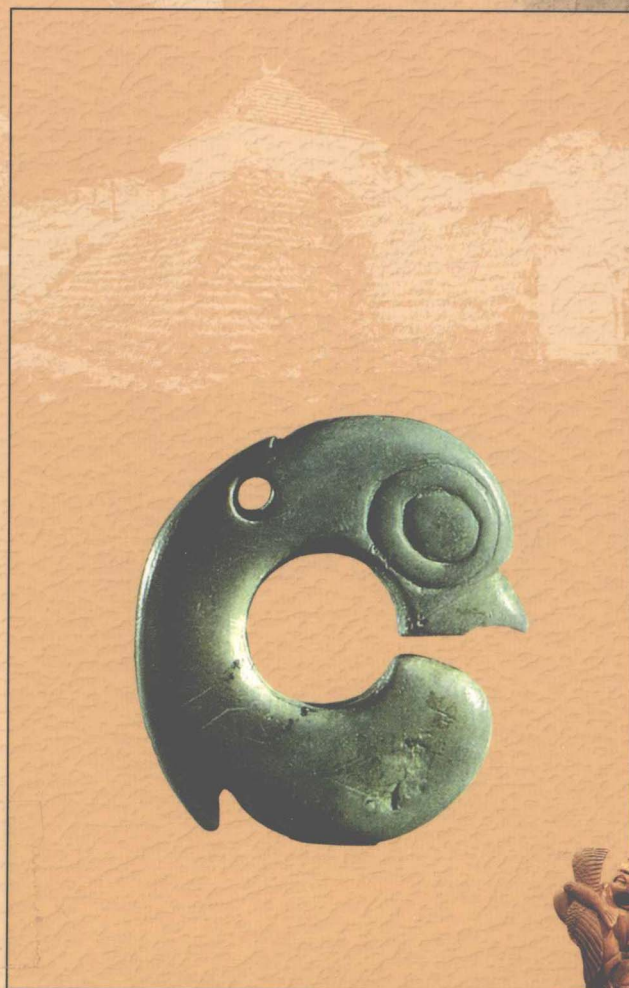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红山

文化与 辽河文明



席永杰 徐子峰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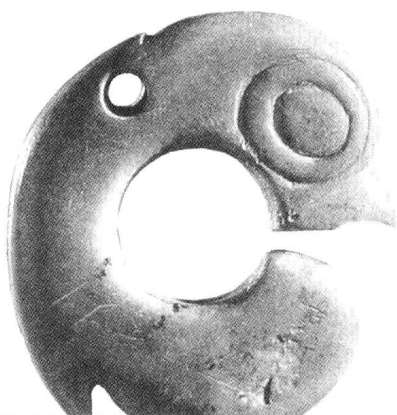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席永杰 徐子峰
● 等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作 者 席永杰 徐子峰 韩英 雪莲
责任编辑 那 顺
装帧设计 马东元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09415—8/K·533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自序

人类社会经历了数百万年旧石器时代的漫漫长夜才步履蹒跚地走进新石器时代，而人类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是伴随距今 12000 年前后全球气候变暖全新世到来之际才发生的。中华大地在距今 8000 年前左右分别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开始萌动人类文明的大潮，一支支各具特色的史前文化相继出现。以小河西文化为起点，兴隆洼文化为源头的辽河文明亦在此时闪烁着微弱的文明之光，从远古姗姗走来。

地质考古研究表明，西辽河流域位于东北大平原西部，其东部是西辽河平原沼泽发育相对较广泛地区。本区中生代为凹陷盆地，喜马拉雅运动之后形成西辽河平原。第四纪堆积了风化残积冲积、洪积和湖积松散堆积物。地貌多为固定、半固定沙地以及流动、半流动沙地。此外还广泛发育沙丘间低地以及湖滨滩地、河漫滩。气候属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其主要特征为冬季漫长寒冷，夏季短促炎热，春季干旱多风，秋季凉爽短促。年平均气温 $5\sim 6^{\circ}\text{C}$ ，一月平均气温 $-12.6\sim -14.0^{\circ}\text{C}$ ，七月平均气温 $23.2\sim 23.7^{\circ}\text{C}$ 。年降水量 $320\sim 450\text{mm}$ ，年蒸发量 $1500\sim 2000\text{mm}$ 。区内河流相对较多，天然湖泊、泡子亦分布较广。本区地带性植被为沙地疏林草原，主要植被类型为干草原、草甸、沼泽和沙地植被。在这些植被下发育盐土、碱土、草甸土、沼泽土、泥炭土和风沙土等土壤类型。是从半干旱地区向干旱地区过渡的地区，这里是对环境变化反应敏感的生态系统过渡带。受气候波动的影响，本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经历了多次农牧交错发展的过程。西辽河流域曾先后出现过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古气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候学研究证实，全新世大暖期期间这里气候温和，雨量丰沛，该区域当时应为森林草原景观。这一时段的西辽河地区不仅气候温和湿润，而且植被繁茂，这里即有平原也有山丘，山前黄土台地是人们喜欢居住的地方，农业生产是与自然环境相互依赖性最强的生产部门，由于大面积的森林能够涵蓄水量，当时区域内水源丰富，早期沙地面积收缩，古土壤发育良好，因此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直到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并非不毛之地，而一直是中华远古人类从事农耕、渔猎、采集、养畜等生产活动的重要场所。

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分布区域地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内蒙古东南部。从大的文化视角着眼，这一区域是连接中原文化与东北亚文化的结合部。考古学资料及研究表明，以分布和流行平底器为文化内涵的东北亚文化区和以“之”字纹筒形罐为特征的东北文化区的核心地域就是这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是北方文明的发祥地和北方文化的源头。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第一，这里不仅有从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经过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一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较为完整的史前文化序列。而且还有以玉、石为载体，相对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内涵独特并与北方文明的起源紧密相联的红山文化埋葬习俗。这种埋葬习俗以墓祭结合的形式，包容了东北文化区原始宗教的主要内涵，构建了以巫觋活动为起点，经过巫师、祭师到祭司乃至祭司集团这样一个完备的原始祭祀礼仪体系，从而积累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史前北方社会不同时期的文明因素，对于辽河文明的孕育和发展，起到了不容低估的推动和传播作用。其二，西辽河流域史前诸文化都具有原始农业特征，同时有采集、渔猎、养畜等经济成分存在。全新世的气候转暖期几乎伴随这些史前文化悠悠数千年的岁月，当时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 3°C 左右，降水比当今高数十至数百毫米。原始景观以疏林草原为主，同时也遍布着茂密的森林，人类在此可耕可牧，可渔可猎。然而在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了一次全球性的环境突发，即突然降温事件。这次降温事件使西辽河流域亦农亦牧较为发达的经济迅速衰落，红山文化在这里突然消逝……然而，红山文化特色分明的文明起源模式却长存于西辽河大地的山川冢丘、草原深处。其三，红山文化在晚期达到文化鼎盛阶段后的突然消逝，并未影响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恰恰相反，其流向之谜引发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论题。有着独特经济特色和原生宗教文化特色的红山文化，在西辽河流域尽管没有最终形成文明，但其文明因素的积累是厚重的。这



种厚重，不仅仅表现为平底筒形罐、之字纹、拥有大型石器及与细石器并存而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多种经济并存导致的史前原始宗教和巫文化的发达，并由此逐步形成的巫觋—巫师—祭师—祭司集团。正是这个阶层的出现、形成和壮大，逐渐取代族权形成神权，并以神的名义迅速构建起具有行政功能的权力框架即政权的初始形态。这些文明因素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即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透射出的文明前夜的曙光。然而五千年左右的降温事件导致了红山文化主体人群的南徙，并成为先商文明的重要源头。这不仅在大量的古文献中有相应记载，更重要的考古学线索是红山文化独特的埋葬习俗——石棺葬在京津唐地区乃至河南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出现，表明了红山文化先民的后裔在近千年的岁月中，沿渤海岸、过京津唐、驻足漳河流域，最后抵达河南腹地所经历的漫长的南徙过程，最终成为先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间尚有缺环，一些环节尚需今后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但这种渊源关系和发展脉络已毋庸置疑。我们认为：红山文化与先商文化的渊源关系不仅线索清晰有据可证；而且先商文明的形成并非中原某一单一的土著文化独立发展而成，而是多种文化因素经过长期的碰撞、交融最终形成的结果。其四，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又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龙文化的源头。自1971年赤峰翁牛特旗三星塔拉玉龙问世后，八九十年代在大小凌河流域不断有形形色色玉猪龙出现，开创并建树了中国史前社会龙文化的辉煌；红山文化亦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源头。与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南北辉映，构建出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为文化背景的一南一北两个大的玉文化中心。为以玉礼制为纽带和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构建，进行了必要的礼仪文化铺垫和积累。其五，红山文化又是东北亚石墓文化的源头。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并不仅仅在于其具有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如以石耜为代表的大型石器群的存在，而以此印证红山文化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强劲；更重要的是，红山文化社会原生宗教昌盛和发达，以致构成中国东北文化区在中国北方文明孕育、发展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和重要链条，这一链条逐步演变成以石墓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带，不仅以月牙形传播带从东北经华北、甘青入川藏至云南，而且东跨医巫闾山，经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并波及日本列岛，而另一脉则经辽北进入吉林至黑龙江，还有一支北上呼伦湖进入蒙古高原乃至贝加尔湖以东的远东南部。追根溯源，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石墓文化其祖源在西拉沐沦河流域，神奇古老的红山文化埋葬习俗是其真正的源头。而以石为载体的神秘埋葬习俗，不仅仅作为商族起源于

北方的考古学实证之一，而且是追寻北方民族源流的唯一可信的重要线索，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或文化共同体，与宗教信仰、祭祀、礼仪相联系的埋葬习俗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尽管以小河西文化为起点、兴隆洼文化为源头的辽河文明未在东北地区最终形成，但它独特的文明演进过程和模式是客观存在的。由此说明和印证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复杂性，并表现为不同的发生发展模式及文明起源道路和途径的多样性。辽河文明的发育和演进过程及甘青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环太湖地区等各有特色的文明化道路，以充分翔实的考古学实证为支撑，揭示并证明着“中心说”和“一元论”的文明起源理论已经与历史发生发展的真实相悖甚远。我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最早形成于中原地区，并不等于中华文明都起源于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出现也并非中原地区土著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碰撞、融合而成；我们还认为，文明的形成和标志与文明的起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用中原形成文明而同期文化没有形成文明来否定其他地区、地域文明因素的积累和创造是不科学的，也违背历史的真实；我们同时认为，地域环境因素对文明起源和形成关系甚大。因此，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的远古先民，其走向文明的道路是有别的，用某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来解读中华文明起源的复杂过程是对历史真实的背离。

壮观神奇的红山巍然屹立、见证着北方文明的萌生和崛起；奔腾不息的西拉沐沦河如泣如诉、传颂着远古先民似梦如歌的岁月和拼搏……

历史如斯，日月不朽，辽河文明永存！

徐子峰

2007年10月于红山脚下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中国史前新石器时代人类发展进程概述	(1)
一、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	(1)
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2)
三、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	(3)
四、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4)
五、中国新石器时代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	(6)
第二章 兴隆洼文化——辽河文明之源	(10)
一、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的类型	(11)
二、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特征	(12)
三、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在中国史前聚落考古中的影响及地位	(13)
四、兴隆洼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发展传承	(14)
五、兴隆洼遗址	(17)
六、兴隆洼文化的居室墓及葬俗	(20)
七、兴隆洼文化的生产工具与经济形态	(23)
八、兴隆洼文化类型	(25)
九、兴隆洼文化陶器与玉器	(29)
第三章 赵宝沟文化——辽河文明之序	(37)
一、龙凤文化的先河	(37)
二、文明信息的流动与传承	(41)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三、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隐含的文明因素	(43)
四、赵宝沟文化的基本特征	(57)
第四章 红山文化——辽河文明之光	(59)
一、红山文化——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59)
二、红山文化的源流、性质、特征及分布	(63)
三、红山文化的分期与类型研究	(64)
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	(65)
五、红山文化坛、庙、冢与文明起源	(67)
六、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	(69)
七、红山文化的重要遗址	(72)
八、关于富河文化	(96)
九、关于小河沿文化	(109)
第五章 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与埋葬习俗	(113)
一、红山文化的房址	(122)
二、红山文化的聚落遗址	(125)
三、红山文化的社会组织构成	(130)
四、红山文化的埋葬习俗	(134)
第六章 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	(141)
一、红山文化的农业经济	(141)
二、红山文化的手工业	(151)
三、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建筑群	(159)
四、红山文化的玉雕艺术	(161)
第七章 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模式与道路	(165)
一、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的起源	(166)
二、独特的文明起源之路	(170)
第八章 红山文化与先商文明	(178)
一、从原生宗教开始的文明因素积累	(179)
二、从神权走向王权的复杂社会	(203)
三、红山文化墓葬埋藏的文明	(208)
四、红山文化是先商文明的重要源头	(218)
五、红山文化与先商文明渊源关系辨析	(221)
后 记	(238)

第一章

中国史前新石器时代人类发展进程概述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先民，在远离文明的悠悠岁月中，经历了无数个漫长的黑夜和黎明，在大约距今 12000 年前，终于送走了充满艰辛困苦的更新世，迈入了全新世这一新时代的门槛，中国史前社会的新石器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

一、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指距今 12000~4000 年前的史前社会，这一时代的开端是以磨制石器的出现和使用为标志。这是人类生产工具发生重要变革的历史时期。在打制石器的基础上，经过磨光加工，器形更加规整，使用更加便捷、灵活且有明确的针对性，这对于人类经济生活的改善是至关重要的。其种类有农业、手工业和渔猎采集业工具等。其中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有斧、锄、铲、刀、镰和磨盘、磨棒，用于渔猎的工具有矛、镞、网坠等。当然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在被广泛使用着。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人类开始了“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定居生活。随之原始畜牧业和手工业也相继出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现并缓慢发展，其中制陶是由定居生活的需要而首先出现的原始手工业。

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的精神世界是迷惘而矛盾的，面对诸如风雨雷电、日出日落、四季更替、生老病死等神奇莫测的大自然，他们的局限于初始状态的认知能力，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产生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以至中后期的原始宗教。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实际上就是对史前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高度浓缩。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特点决定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和结束也不会是整齐划一的，错落有致的发展格局恰恰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真实。

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经过考古学界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田野考古的全面展开，一批批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确立，使传统的新石器时代概念和分期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目前考古学界基本认同的新石器时代从时间上说是距今 12000 年前至 4000 年前。从经济形态上看，除过去考虑到的石器的发展、陶器的发生等因素外，同时把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开端的标志。这样，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变化也成为新石器时代分期的重要依据。综合这些要素，考古学界依据其文化发生、发展的阶段特征，将史前新石器时代进一步细分为四个阶段。

初期 约距今 12000~9000 年前。人类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开始制陶器，农业出现萌芽。这一时期的遗址有广东省阳春县独石仔、封开县黄岩洞、广西柳州白莲洞第二期文化、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南勿乎井、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河北徐水南庄头等。

早期 距今 9000~7000 年前。这时人类已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和陶器，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和氏族公共墓地，如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华北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等文化。原始农业处于“火耕农业”阶段。

中期 距今 7000~5000 年前。彩陶已大量使用流行，石器发展到以磨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的使用比例明显减少，农业也已发展到锄耕农业阶段，家畜饲养业得到普遍发展，猪已成为主要家畜。



晚期 距今 5000~4000 年前。陶器的制作技术明显提高，已普遍使用轮制。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高峰，出现南“良渚”，北“红山”两个玉文化中心。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都进入了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太湖地区可能已发展到犁耕农业，燕山以北、内蒙东部及辽西地区农牧交错地带的宜农宜牧经济也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

三、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仅从 1989~1997 年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新发现就有 24 项，同时确立了约 50 种以上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步搞清了全国主要新石器文化的序列与编年。特别对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诸文化谱系有了较深的认识^①。在中原和南方调查发现的几千处遗存中，已发掘的百余处文化遗存，分别属于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以及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江淮流域的青莲岗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许多学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区系类型和文化体系进行了独有见第的归纳。1980 年，石兴邦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三大板块；1981 年，苏秉琦提出了史前文化的六大区等理论；1986 年，佟柱臣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七个文化系统发展中心；1987 年，严文明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按不同的经济形态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这些文化类型学理论的提出尽管观点不一，但都把中国史前文化看成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目的都是力图建立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时空框架体系，都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考古学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时空关系，从而为探讨诸如中国文明的起源、民族的形成等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②。

① 任式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 年，第 9 期。

② 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四、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作用表现为对文化发展历程的影响、对文化发展速度的影响、对文化特征的影响、对文化格局的影响、对中华文明早期发生发展的影响等五个方面。

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历程的影响

地理环境在人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全新世以来，第四纪冰期结束，全球气候渐趋温暖湿润。适宜的气候为中国早期农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正因如此，在距今大约 10000 年前，我国由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特别是距今 8000 年前以来，全球气候进入了温暖湿润的适宜期。这一时期的气候条件，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和文化发展至此进入了繁荣时期。正因为距今约 8000 年前直至商末周初我国连续处于温暖湿润的适宜气候中，加之地理环境等其他要素的影响，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连续发展和积累的基础上，在距今 5000 年前，我国社会跨入了文明时代。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到农业经济的繁荣，再到文明的形成和初期发展，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整个历程无不受到地理环境诸要素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速度的影响

早期人类对自然界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不同地域不同的自然条件对文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如果自然环境过于严酷，人们难以获得食物的资源，生产力中物的因素长期不足，使物质资料的生产极为困难，而劳动者的智慧和认识能力还不足以克服这些困难时，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长期停滞。反之，如果自然条件过于优越，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劳动对象极易获得，人们无需花费很多的时间和努力就能维持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这样抑制了劳动者的需要，影响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能力。抑制了劳动力这个因素的发展，从而在这个地区阻碍了生



产力的发展，亦即阻碍文化的发展。而适度的自然条件不仅可以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而且也使得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在自然环境影响下形成的人的需求和动力，对文化的发展极为有利。我国地域广阔，地理条件复杂，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受其影响，新石器时代各地文化的发展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速度明显快于华南地区和北方草原荒漠地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差异，不仅是文化面貌特征的差异，而且也是各区域文化发展速度与水平的差异。

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影响

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生成与发展的，因而总是带有环境的烙印。中国史前文化是在相对隔离的特定地理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因而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表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特征。由于我国地理环境十分繁复，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表现出文化统一性的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对于某一具体地域而言，其新石器时代的经济类型、生产生活用具、建筑样式等都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特征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各地自然条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影响

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具有人对地依赖性强，地对人制约严格，相互作用极为直接等特点。人类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新石器时代我国文化区域与文化格局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区域差异的影响。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特点及或大或小的区域性分异，使得各地文化呈现区域性特征。同样是受我国地理环境东西及南北的综合性差异的影响，在我国由东北大兴安岭至西南横断山脉地带以西以北形成了与自然条件相适应的狩猎-游牧经济文化区；在这一地带以东以南地区，由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作用，形成了新石器时代我国的农业经济文化区。在我国东部的农业经济文化区中，秦岭—淮河一线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以北发展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旱作农业区，以南成长为稻作农业区。在我国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并茂、共同发展的格局。又因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适度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超过了周围地区，率先成长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达区域。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早期发生发展的影响

可以说自然环境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这种环境不仅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保障，也使得中华文明具有了本土起源的特点。适宜的气候、适度的自然条件也为中华文明的成长提供了条件。受我国地理环境特点的影响，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核心，并且如“满天星斗”，有多元发生，共同发展的特点。当然，中华文明早期的发生发展也受到人文因素的影响，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文化中心的形成及随后夏朝在中原的建立，都与战争以及文化交流与文化整合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自然地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的。



五、中国新石器时代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

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体现在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采集渔猎经济的存在、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对居住地的选择、因地制宜的居宅建筑、生产生活用具的制造、对原有生态系统的干预等七个方面。

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

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反映出人的起源地，也反映出稻作农业经济的发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展，集中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水平。伴随着农业的发展，水井也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了距今 6000 年的水井遗迹，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遗迹。考古发现还表明，在黄河流域中游的龙山文化中，凿井技术已经兴起，至今已发现四座古井遗迹。井的发明反映出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增强。

采集渔猎经济的存在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是以农业的发展为核心和主线的。然而在

这一时期，采集渔猎经济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农业并存且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情况尤其如此，随着农业的发展，采集渔猎经济所占的份额在不断下降。从空间来看，在农业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采集渔猎经济相对发达；在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采集渔猎经济地位较低。采集渔猎经济活动的开展，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低水平的利用。公元前 5000 年以前的河姆渡、马家浜文化都是种植稻米的农人，但也都是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他们的食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自然的资源，而他们所用的器具中有很大部分来自兽骨。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重要地区，然而在稻作农业发展的同时，采集渔猎活动仍占有相当的比重。从空间布局来看，华南地区高温多雨，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食物，因而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发展相比，这一地区农业经济极不发达，采集和渔猎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我国北方的草原荒漠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早期农业发展缓慢，兴起较晚。在新石器时代，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和狩猎，特别是狩猎经济相对发达，后发展为游牧经济。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中华先民对于自然的适应和利用。

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家畜饲养业的兴起是新石器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反映了人类由对天然动物资源的利用进展到对其进行一定改造的阶段，也反映出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自然界影响作用的加深。考古发现表明，在秦、淮以北的黄河流域，人们利用其土壤肥沃疏松、气候适宜等条件，在草原、盆地和黄土高原台塬等地区，发展起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从考古文化遗存中，发现有农业生产工具、粮食加工工具以及碳化、灰化的谷子，说明新石器时代我国黄河流域是以种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类型。在秦、淮以南的长江流域，与当地气候、土壤、地形相适应，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发展起我国的稻作农业。人们开始用水牛和石犁耕作，用木杵和石臼加工稻米。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中，发现有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加工工具以及稻谷遗存，说明长江流域是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源头。

对居住地的选择

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反映出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利用和改造。例如，中原地区的人类对于居住地的选择就充分考虑到了当地的自然条件的状况。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先民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选择居住地主要取河道比较稳定的大河支流的两岸阶地，取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地势相对较高，既避免了低潮伤身，又可防犯敌侵或避免水患。王妙发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聚落的细致考察和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先民对居住地的选择大多考虑到靠近水源、便利生产生活的问题。先民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选择可归纳为五种情况：一是选在河边台地或河流转弯处及支流交汇点高于四周的岗上，二是水泉近旁，三是依湖而居，四是近水区域高出周围的土墩上，五是沿海地区的贝丘上。可以看出，早期先民对居住地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靠近水源的问题。中国新石器时代对居住地的选择，其中选址靠近水源的考虑，不仅是出于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水陆交通便利的需求。

因地制宜的居宅建筑

居宅建筑的样式是建立在人们对自然环境认识的基础上的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和改造，反映出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对其周围自然环境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加以利用和改造，创造出了富有地域色彩的居宅建筑文化。在黄河中上游黄土堆积深厚的黄土高原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窑洞式穴居住宅遗址；在中原地区和华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因地制宜，创造了自己的居宅建筑文化。居宅样式经历了由穴居住宅到地面建筑再到土台建筑的发展过程。而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由于降雨丰沛、气候潮湿、地下水位偏高等原因，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利用自然条件创造出干栏式居宅建筑文化。如在浙江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 7000 年左右的干栏式木构建筑 3 座。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特点，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因地制宜、不断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使居宅建筑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生产生活用具的制造

生产生活用具的制造是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重要活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是在对岩石、土质等认识的基础上的利用和加工改造。一些质地细腻且较坚硬的岩石，如燧石、脉石英、玄武岩、角页岩、黑曜岩、花岗岩等，成为加工生产生活用具的原料。这一时